

上海的洋泾浜语

华人和洋人互相交际的频繁,在上海外滩附近的洋泾浜地带,曾产生过一种夹杂上海话的变形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语”。“洋泾浜”在当时上海县城的北郊,是旧英、法两租界交接处的一条河,1915年已填埋,今为延安东路。19世纪末叶起曾是外国商人聚集之地,也是洋人华人相处最为热闹的通商地,当时上海道与租界签订的一些协定也自然常冠以“洋泾浜”名。华人执业洋行之中,下层百姓为做生意或打杂,必须与洋人打交道,于是一种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用上海话语法拼缀的简单英语语句就此产生并流行,成为举世闻名的“洋泾浜语”。这些洋泾浜语在当时是很实用的语言,连从英国来的洋人也必须学了它才能通话。外国人对中国的“洋泾浜”很有兴趣,根据中国人发英语“business”这个词的洋泾浜音,给这种语言现象定名为“pidgin”,于是又有“别琴语”、“鸽子语”的别称。

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上海洋泾浜地区的“上海洋泾浜语”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在语音上受上海话影响。把辅音“r”说成“l”,如:“all light(all right)”、“loom(room)”；把英语词尾的辅音加上“ee[i:]”,延伸成一个音节,如:“Talkee he. (Tell him.)”“My wanchee walkee. (I want to go for a walk.)”“What side catchee? (Where is that from?)”；把辅音“t”读成“chee”,如:“My no wanchee. (I don't want it.)”

2. 语法上用自由形式取代了词尾变化,放弃了数、格、人称等形态变化。如“I”、“me”、“my”、“mine”都用“My”表示,像“My no savvy. (I don't understand.)”“Pay my. (Give me that.)”“This b'long my. (This is mine.)”又如不用冠词:“My wanchee bath. (I want a bath.)”

不用动词时态形式：“No likee. (I don't like that.)”“No can do. (That will not do.)”

3. 受汉语量词的影响，泛用“piecee (piece)”当量词用。如：“Catchee my one piecee rickshaw. (Get me a rickshaw.)”“Pay my two piecee. (I will take two of them.)”

4. 泛用“time”表示时间，“side”表示空间。如：“another time (again)”“What time? (What o'clock is it?)”“Time bye. (Afterwards.)”“This side. (Here.)”“all side (around)”“What side? (Where is it?)”“Go topside. (Go upstairs.)”“top-side (above)”“Go bottomside. (Go downstairs.)”

5. 用“belong”表示“属于”，泛用代替系词“to be”。如：“That b'long bad pidgin. (That is a bad job.)”“What this b'long? (What is this used for?)”

6. 用上海话语法和语序组装英语词语成句。如：“Barber have got? (Is there a barber in the hotel?)”“Hotel side can sendee? (Can you send this to my hotel?)”“Can do. (That will do.)”“What thing? (What is that?)”“You look see talkee my. (Go and see, and come back and tell me.)”“No can do. (Stop that.)”“No have got. (He is not at home.)”“Talkee he come this side. (Tell him to come back.)”“Too muchee dear. (That is too dear.)”“Talkee my. (Please let me know.)”“Pay my look see. (Just let me look.)”

7. 词汇基本上来自英语，也用英语俚语，如：“Savvy? (Do you understand?)”也有来自上海话及印度带来的词语。如：“Man man. (慢慢 Wait a bit.)”“Auso. (豪燥 Be quick.)”“Auso di. (豪燥点 Go quicker.)”“Dang sing. (当心 Be careful.)”“Faung au lay. (放下来。Put the rickshaw (黄包车) down.)”“Chin-chin. (请,请。How are you; Good bye.)”“Doo-maloo. (大马路 Nanking Road.)”“chit (信、账单)”“godown (货栈)”。

8. 常用词的使用范围比英语大得多，这是对生词的回避策略。如：“Come chop chop. (Come at once.)”“Catchee tea chop-chop. (I

want some tea at once.)”又用“numa one(number one)”引申表示“顶呱呱”，用“catchee(catch)”表示“得到”，用“Man-man”表示“stop”。

9. 简化的表达,这是用缩略弥补口拙。如:“Can do? (Can you do this for me?)”“Talkee true? (Do you mean it?)”“What fashion?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Wanchee all same. (I want it like that.)”“Pay my hot water. (Get me some hot water.)”“Can secure. (Will you see to do it?)”“Talkee cook three piecee man dinner. (Tell the cook to prepare dinner for three to-day.)”

10. 换话表达。“What side my room? (Show me my room.)”“No can cuttee? (Is that the lowest price?)”“Can puttee book? (Is the bargain settled?)”“You can lolly my? (Can you make an allowance on damaged goods?)”“S’pose no do, my makee largee bobbery. (If you don’t do this, you will get into trouble.)”

以上的例子主要来自 1902 年出版的《上海旅客和居民手册》。1912 年上海出版的英文版的《上海旅游指南》里也列举了一些洋泾浜话,如把“Do you understand?”说成“Savvy?”,把“stop”说成“Man-man(慢慢)”,把“Can you tell me what this is?”说成“What thing this b’long?”,把“Can you do this for me?”说成“Can do?”,大致与 1902 年书相同,可见当时的上海洋泾浜语还是比较稳定的。

在下层群众中,还流行一些洋泾浜色彩浓郁的外来词和俗语,有的一直流传至今。如把“管门人”叫“抛脱(porter)”,把“蠢人”叫“阿木林(a moron)”,把“找机会”说成“混腔势(chance)”,把“办法、窍门”说成“挖而势(ways)”,称“摩登”为“发噱(fashion)”,把“全部”说成“骨碌三姆(gross sum)”,把钞票多说成“麦克麦克(mark mark)”,身无分文说成“毕的生司(pitty cents)”,把“非常感谢你(thank you very much)”说成“生发油卖来卖去”。把“让我看看(let me see)”说成“来米西一西”,把“Never mind”说成“Marskee”(“笃定马思开”一语就从此而来)。又如把“一只船有两只眼睛,没有眼睛,如何能看见?不能看见,如何能够走?”说成“A boat has two eye, No eye, how can see, No can see, how can go.”(见于曹聚仁《上海春秋》)上海人称“寿头码子”、“小

刁码子”的“码子”来自“moulds”。

朱大可先生曾列举现今上海方言中有不少比较活跃的词语,认为皆来自当时的“洋泾浜”。比如:“嗲”是“dear”,由亲爱的、可爱的引申为娇柔的、媚态万千的;“轧朋友”的“轧”是“get”,搞到的意思,“轧朋友”为搞女人、结交异性;“拉三”是“lassie”,由少女、情侣引申为妓女或不检点的青年女子;“大板”的“板”是“banker”,由大银行家引申为大老板、富豪;“退灶水”是“退 juice”,本为流氓退还敲诈得来的油水,引申为丢脸、失面子;“克拉”是“colour”,由色彩引申为时髦的、衣着光鲜的;“接领子”是“接 leads”,接提示或接暗示;“着台型”是“着 dashing”,由穿着很漂亮引申为出风头、自我炫耀;“噱头”是“shit”,由大便、胡说、大话、蹩脚的商品或表演引申为引顾客上当的骗局或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引人发笑的手段;“嘎三壶”是“gossip”,聊天闲谈;“邋遢”是“litter”,由杂乱、四下乱扔废物、东西引申为杂乱、凌乱和不修边幅;“蹩脚”是“bilge”,由船底污水引申为肮脏的、下三滥的、劣质的;“大兴”是“dashy”,由浮华的、华而不实的引申为假的、冒牌的、劣质的;“肮三”是“on sale”,由二手货贱卖引申为垃圾货或人品低劣;“瘪三”是“begsir”,乞丐先生,用来形容叫化子、难民、逃荒者等以及泛骂用语;“蠢大”是“gander”,傻瓜、呆鹅、糊涂虫;“赤佬”的“赤”是“cheat”,本义是欺骗;“小开”的“开”是“kite”,由骗子之意引申为对有钱人的泛称;“门槛精”是“monkey 精”,由猴子精引申为聪明的、精明的;“混枪势”是“混 chance”,由混机会引申为浑水摸鱼(朱大可,2000)。

上海的洋泾浜语一时十分活跃,以至有些人把它编成顺口溜,下面一则洋泾浜歌诀选自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汪,1935),笔者配上了英语。这则歌流传很广,笔者父亲一辈至今还有老年人会用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哼上几句:“来是‘康姆(come)’去是‘谷(go)’,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ty-four)’,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真崭实货‘佛立谷(fully good)’,靴叫‘蒲脱(boot)’鞋叫‘靴(shoe)’,洋行买办‘江摆渡(comprador)’,小火轮叫‘司汀巴(steamer)’,‘翘梯翘梯(tee)’请吃茶,‘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依坐,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东洋车子‘力克靴(rickshaw)’,打

屁股叫‘班蒲曲(bamboo chop)’，混账王八‘蛋风炉(daffy low)’，‘那摩温’(number one)先生是阿大，跑街先生‘杀老夫(shroff)’，‘麦克马克(mark)’钞票多，‘毕的生司(pitty cents)’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爷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in-law)’。”

到2000年再来话说“洋泾浜”，许多陈迹已成为笑话。8月24日范敬宜老先生在《新民晚报》上说了那时的几个例子：外国主人回家，见玻璃窗打碎了，问仆人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inside 吱吱吱，outside 喵喵喵，glass 克郎当！”洋主人一听便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说：“Man mountain man sea, today no see, tomorrow see, tomorrow see, same see.”这些“洋泾浜英语”外国人都是听得懂的。范先生还说到“洋泾浜中文”：圣约翰大学的老校友如今还回忆起他们的老校长美国人卜舫济，这位中国通一次在大会上讲：“兄弟今朝有两个屁——放(譬方)，一个屁——放在中国，一个屁——放在美国”，引起哄堂大笑。我想，当时卜校长一定是在说上海话，因为他也是研究上海话的专家，上海话里原来“比方”一直是说“譬方”的。这些当然只能说是洋华人之间交际中的洋泾浜现象，而不是“洋泾浜语”。

我们不能轻视洋泾浜语的历史作用，任何语言即使是在初胚期也应是平等的，洋泾浜语对上海早期的商业起步和国际交流有积极意义，对当时促进经济繁荣和商业交际是有贡献的。

然而，“洋泾浜”毕竟有食而不化之嫌。随着上海人的英语水平提高，上海的洋泾浜语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衰落消失。惟有那些中外杂交产生的洋泾浜色彩的词语，还有不少流传至今。19世纪末的20年和20世纪初的20多年，是上海经济发展迅速的年代，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代，因此新词新流行语表现得蓬蓬勃勃。有人惊呼市井新语这么多，殊不知，那时候各方面产生的新词新语也呈高潮期，如：共产党、社会、哲学、文化、艺术、图书馆、博物馆、报馆、自来水、电灯、铅笔、卡车、摩托车、足球、篮球、洋房、钢琴、明星、马路、影戏等等，只是这些词语已经成为今天的日常用语，人们视而不见而已。

上引的洋泾浜顺口溜到 20 世纪 50 年代还留在人们口中回味。50 年代以后,上海话中夹杂洋话的现象已成绝迹。在把听美国之音的人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岁月里,“English”用上海话被贬成了“阴沟里去”!但是,上海毕竟是上海,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开放以来,中西融合重新活跃起来。如今,年轻人中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白领阶层里,在上海话对话中夹带一两个英语词语,如说“请侬拿报表 Fax 出去”,“去 copy 两份”,“到 W. C 去趟就来”,“去叫 office 小姐”,“借我 see see”,“开 party”,“打 kiss”,“摆 pose”,“侬哪能介 fashion 啦(你怎么这么时髦)”这样的用法已很常见,在襄阳路、城隍庙等处的小商品市场的交易中,也时常听到有中国语法的蹩脚英语。因特网上的群众语言更是推波助澜,如 2000 年《上海电视周刊》第 17 期的“本周视点”中记下了“最近最时髦”的用语:“Hi,你好呀,This morning,我们对你的 case 进行了 discuss,我们发现,这对我们没什么 benefit。所以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与这件事相关的所有 project 都将被 cancel 掉。”作者称“这就是目前最为引人注目的中国 IT 人时髦、标准的说话方式”。当今在上海知识阶层和群众中,说方言时夹国语词说普通话时夹英语词,自由自在,似都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在这经济全球化、网络全球化的 21 世纪,外国都用“APEC”、“WTO”,你非得用意译中文名词吗?保守派不必担心,中文中夹几个外文,像夹几个阿拉伯数字一样,不会影响她的“纯洁”,只会使她表现力更丰富,20 世纪初上海进口了那么多的外来词语现今都已用惯便是明证。

上海方言词语中的商务气息

上海社会自开埠起,迅速从农业社会走出,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建设成了很成熟的商业社会,就连上海语言中也处处渗透着商务气息。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种是日常用语用到商业方面去,赋予商务专门意义;另一种是商务词语的词义扩大为一般用语经常使用。

先讲赋予商务专门意义的日常用语。上海人最先把商业范围中的职业称作“饭碗头”,“铁饭碗”指稳定的职业,“吃饭家生”即工作的用具。又把没有经济收入叫作“吃死饭”。“有饭大家吃”,就是提倡生意一起做,有福同享。“吃进”用于不合算的交易上,如说“掰点剩货我好吃进”。“敲碎饭碗”,指失去了职业。还有一种据说是“橡皮饭碗”,敲来敲去敲不碎的,指的是那种甚为稳固的职业,过去指邮政、银行等职业。上海人把不少习惯用语用于商业行为。如“孵豆芽”指无工作或不参加工作呆在家中,坐待时机。用“卷铺盖滚蛋”表示被辞退而离职的意思。“开眼乌龟”喻见钱或见物眼开的家伙,“钱”就叫它“孔方乌龟”。“塞狗洞”喻把钱花到无用之处。“垫台脚”指行贿、找靠山。“卷地皮”指席卷财物而光。“敲竹杠”指借端要索或故意抬高物价。“拉皮条”原指从中勾引男女相识而成暧昧行为,后来就泛指介绍双方相识促成商业行为。用“拿摩温(No. 1)”指工头。“螺丝壳里做道场”,形象描绘即使在局促的寸金之地也办厂做精密仪器的聪明才智和适者生存的能力。“一拳来,一脚去”,反映利益争夺的白热化。“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描绘商场上竞争兼并的你死我活景象。

近年来,这类词又有新的发展。人们讽刺请客送礼风,于是有“烧香”喻指行贿、“进贡”喻为利用他人而送礼两词。“撬边”指从旁帮腔助阵,怂恿买者购物的行为。“割肉”喻股价下跌而忍痛抛出。“斩一刀”

指敲一个竹杠,原先在个体户中使用,现已通用,被敲诈或被骗钱称“被人家斩”。“下海”原指京剧“票友”自己上台去唱戏做戏,后又指去做舞女,现在也用到商业上去,指改变职业去经商。“跳槽”原指牲口到别的槽头吃食,后用于嫖客更换妓女,现在却指离开原职自动改变职业。“承包”、“加盟”两词也主要用于商业活动了,如说“名家加盟创作”。“立升”一词原是度量词,常用于说冰箱的容量,现在可用作指“资本的充足程度”、“实力的雄厚程度”。

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使很多原来在商业范围里使用的词语扩散到群众的生活领域,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常用语。

“买卖”是商业行为,但上海人在日常生活里把“买”和“卖”引申得出神入化。如用“卖相”称人的外表。给人情通融说“买面子”或“卖人情”。会做而故意不做不说来要挟,说书说到紧要处不说称“卖关子”,行贿叫“买关节”。承认对方的长处表示服从说“买账”。使劲称“卖力”。拼命干叫“卖命”。用“拚血本”指不顾性命拼着命去干。以娇媚诱惑人称“卖俏”。摆老资格叫“卖老”。装作精通,实际弄假骗人,叫“卖野人头”。有的商务词语已经一般词语化,如“卖狗皮膏药”现指自我吹嘘,弄虚作假,本义已不用。

“货物”也用到指人品上去。如用“好货”讥讽品质不好的人,用“宿货(因滞销而积存的货物)”讥讽或詈骂胆怯易屈服的人。用“大路货”喻很普通的人。用“推扳货”称品质差或胆小、能力低的人。用“蹩脚货”喻品质差、能力差的人。用“次货”、“次品”、“处理品”称等次低下不合格或淘汰下来的人,有时指生活上有污点的女人。还有直接把对人品的特征用于类词缀“货”上,如骂“浪荡子”为“浪荡货”。骂“粗鲁的人”为“粗货”。称“不涂脂抹粉的妇女”为“清水货”。用“一票里货色”称一丘之貉。把“不懂”、“搞不清”或“没眼光”称作“勿识货”。

算账也翻新扩用到日常生活上。如“出账”、“进账”用于广义的支出和收获。“倒扳账”用指事情结束后又重新翻出来计较。“翻老账”是把过去的事情抖搂出来。“勿关账”就是不管的意思。对人与事不服或不给面子,常说“勿买伊个账!”把事情做糟了,理不清头绪,称“一笔糊涂账”。还有说说一段时间做了些什么,叫“报报流水账”。骂人时说真

是“混账王八蛋”。一事当头，就要讲究“合算勿合算”，算账的观念人人皆备。有的人是“一分洋钿拗两半”，说它节约；有的人是“戆进勿戆出”，说它“门槛精”。

上海人的生活也老像在做生意，“叫人勿折本，舌头打个滚。”把“不折本”这个商业行为用于讲礼貌会有好处。上海人把看不入眼不像话的行为都斥责为“勿是生意经”，表达坚决不答应或不妙了的意思也用“勿是生意经”来说。抢事干，也叫“抢生意”。推介，也叫“兜生意”。足见“生意”在上海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用“放伊一码”表示饶他这一遭。在江湖上用“放生意”指设圈套。用“耳朵打八折”怪罪对方没听清自己的话，用“闷声勿响大发财”比喻因沉默而得利。用“一分行情一分货”称货真价实。如果很看不起某个人，喻人差劲无价值，就说他“一钿勿值”。用“勿值铜钿个”形容地位轻贱、受人鄙视或毫无用处，甚至说“一个屁钿也不值！”而用“吃价”称赞人的有能耐、与众不同。“价钱”用于“心理”称“心理价位”，则不仅指你买货物时的价格承受度，也扩用指对许多事情的评价了。以生意买卖作话题的，还有“买空包”指受骗上当。“掂斤两”指试探估计对方人或事的力量或重要作用。“讲斤头”也是从买卖用语比喻而来的，一斤一斤死扣地谈，现移用作日常生活中的各不相让地谈条件。“有还价”原指可以还价钱，现指有商量余地或有条件需议。以交易票据为议题的，如“打回票”即退回的意思。“打包票”原是写下保证成功的单据，现就指保证、包在身上的意思。“空头支票”、“远期支票”指不能兑现的虚空允诺。“地方粮票”是在特殊年代使用的一种证券，上海知识界把它引申到享受限于某范围中承认的职称及其有关的利益中去。女子出嫁，一切依赖男方，即把此男子称为“长期饭票”。“三下五去二”是打算盘的口诀，喻作事干脆利索。“三一三十一”用作一分作三的意思。“肮三(源自 on sale)”原是大减价的意思，现在用作令人失望不快或不正派。“勿管三七廿一”，其词源出自赌场，骰子六面共 21 点，与孤注一掷是同出一源的，现在指不顾一切的意思。“拨侬一只五分头”更是用形象作比喻，实是“打你一个耳光”的意思。

“洋盘”一词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诞生于上海商场上，从指商品行情

的“盘子”开始引申而来，“盘子”来自计算价钱的“算盘”，开店老板就拿出算盘来摇上几摇曰“开盘”，打烊就说“收盘”，清理存货就说“盘点”。从旧上海交易所直到现今股市上还在用此两词。后来“盘”字就变成“价额”的意思，“今天定什么盘子？”商店大减价称“大放盘”，此词现今也已复活，并又有“爱心大放送”、“旺情大派送”的新引申。那时的“盘”又活用形成“红盘”、“明盘”、“暗盘（暗中抬高物价敲竹杠）”、“客盘（对客边人即外地人利用他的地生人不熟开大价）”，对“洋人”当然用“洋人加倍”的“洋盘”，有人不知其诈，于是有“洋盘末切勿要去买个”（1941年出版的法国传教士布氏《上海方言语法》91页）之类的忠告。上当的人多了，不仅是外国人，那些花冤枉钱的人便冠之以“洋盘”的称呼（可参见汪仲贤的《上海俗语图说》6—7页）。从“算盘”到“洋盘”的词义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在商业行为发达的都市上海，市民思路的开阔，造词不拘一格的灵活性。现在“洋盘”已广指不内行、不识货、对事物缺乏经验的人，常指在都市里遇事上当又不觉察的人；它还可作为形容词，称不内行、不识货。

许多商业行为被赋予常用意义，在上海话特多的三字格惯用语中有不少。如“开码头”后指出门去外地闯荡。“闯市面”指闯荡打开局面。“上台面”指很体面。“现开销”指当场以言语直率对付、不留情。“照牌头”喻依靠别人的力量作靠山办事。“塌便宜”原指讨便宜或占便宜，后指轻佻地打人或抚摸女人某些地方的侮辱行为。“摆摊头”原是小贩设摊卖货，现引申为东放一些，西放一些。以钱财为对象的，如“捞外快”，本义指捞取额外的收入，引申为捞到意外的好处。“讲价钱”原指做买卖时的讨价还价，后喻指接受任务时提出要求的条件和报酬。凡一事要新开张，上海人称“新开豆腐店”。“生活”在吴语里有一义是指“工作”，即“活儿”。但“吃生活”在上海话里引申作“挨打”。“真生活”原来是指“非常花力气花时间的活儿”，后来变成形容词，从“真吃重”和“功夫真实”变成“真棘手真够呛”的意思，又说“真叫生活势劲！”“套牢”原用于股价下跌资金被困，现可活用作结婚后想离婚却不成，以及被某事情牵绊。另外像“打小算盘”、“装门面”等都是商务词汇的引申。某人非常会为自己利益着想，说他“算盘珠拨了勿要忒响噢”、“算

盘珠打得滴笃转”。某人思想不合时尚,就说他是“勿领市面”。

到20世纪90年代,上海商业大发展,社会活力增强,思维更趋活跃,有些词语出现了连续蔓延式的扩义运用。群众用“移就”的修辞方法,渐渐形成了不少短语格式,在日常生活中把商务词语翻新用到各个地方去,如感情“赤字”;“热门”专业;“亏空”精力;“损耗”元气;“消耗”脑力;智力“消费”;“花费”精神;“支出”感情“本钱”;“支出”时间(精神、情感);“付”了不少“学费”;“欠”了感情“债”、“养育债”、“孽债”;“储蓄”感情;在她身上“投”了点“资”,“搞”了点“基本建设”;在争权夺利上“讨价还价”;用漂亮的“牌照”,要名大学的“牌子”,打红色“招牌”……“包装”一词扩用,用于“行业包装”、“名人包装”、“形象包装”、“评语包装”,“新登场”(来自日语)、“大放送”,这两个词是一般词语专用于商务,“爱心大放送”、“旺情大放送”、“感情大拍卖”又把它转用于生活。上海商业的繁荣催使一些原本用于其他场合的词语带上生意场上的气息。如“敲定”原出自男女谈恋爱,“拍板”出自政治会议的集体决定,现在都常见用于商业谈判。“白板”用作没做成任何生意。“拗断”指朋友之间的绝交,现在也用在商务关系上说断绝关系。反之,又把“清仓”、“割肉”等词用进股市。一时间里,新词新语纷纷出笼,商业用词和生活用语大杂交,如“资金短路”、“名人包装”、“离婚解套”、“联手炒作”、“盘活无形资产”、“进行功能开发”、“玩价格魔方”、“开发感情资源”、“抓菜篮子工程”、“再就业工程”等等,旧词新用,“瞎七搭八”,新意层出不穷,充分反映社会思想的活跃。有的词并迅速变成类后缀,如“价”字一下子构成了“启动价、起板价、探底价、成本价、让利价、热销价、倒贴价、优惠价、奉献价、牺牲价、跳楼价、黄牛价、绝版价”等一族词语。原来喝酒的店上海称之“酒吧”,“吧”是英语“bar”的音译词,20世纪末,上海人注重工作后的休闲,应各种休闲情调而生的场所先是有咖啡吧,又叫“咖吧”,后一发不可收地有了“茶吧、冰吧、陶吧、瓷吧、画吧、布吧、琴吧、奇石吧、怀旧吧、歌剧吧、球迷吧、漫画吧、玩具吧、书吧、迪吧、渔吧、氧吧、网吧”等,生活艺术中都有“吧”了。

商业社会真是无底洞,推来变去,而词语在这方面即时反映其存在的真面目,是最忠实的。有的词语如“卖身投靠”、“身价百倍”,在前

些时候已淡忘了它们的原始本义,如今其原来的本义重新复活。“吃青春饭”的含义也延伸扩大。欲责罪于词语的出现或流行,不如责罪于社会事物的本身。

上海是一座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下中国内陆任何一个城市,我们从民间使用的层出不穷的商业词语里也能寻觅到这种商业繁荣的深刻痕迹。

从上海话流行语中看到的

上海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话又是我国汉语第二大方言区吴方言的代表。会说上海话的人不但遍布太湖片，而且已跟随着上海人的足迹流传各地，不但在大陆处处可闻，而且远布我国港台地区及欧澳日美，传播着大上海的民风 and 文明，各方面的人来到上海，要与上海人深入沟通，都要学点儿上海话，因此上海方言的整理和研究对于建设一个开放性的远东大都市有着现实的意义。其实，自从上海在 19 世纪中叶刚开埠以来，就有外国的传教士和学者十分认真地编写过不少上海话的词典和语法书，最早的有 1853 年 Edkins 氏的《上海口语语法》等，成为用现代的语言学方法记录研究我国方言的第一批著作。我国的学者也曾写过一些书，其中以收录上海方言俗语或称流行语的著作最为有名，如 1924 年严芙孙著的《上海俗语大辞典》和 1934 年汪仲贤著的《上海俗语图说》。这两本书记写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全盛时期中的方言俚语，现在我们经常提到的许多颇有特色的当时留下来的词语如红头阿三、洋行小鬼、白相人嫂嫂、掮客、小白脸、三脚猫、半吊子、拆白党、外国火腿、戳壁脚、吃牌头、看脚路、拉皮条、出锋头、卖野人头、捞锡箔灰、吃讲茶、仙人跳、十三块六角、驼子跌跟斗、拆空老寿星、叫花子吃死蟹、崇明人阿爹等，在这两本书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和生动的描绘，究本寻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年的社会面貌、历史文化民俗保存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半个世纪以来，这方面的书一直没有出版过。现在，上海又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批外来人口（包括外地人和外国人）重新涌入大上海。继《上海方言俚语》、《上海方言词汇》等书在近几年出版之后，近来由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的阮恒辉、吴继平编著的《上海

话流行语辞典》又是一本值得注意的、广收上海话流行语的新作。两位先生不辞辛劳,煞费苦心,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调查,甚至充扮角色进入一些圈子里去收集词语,集得流行语 1 073 条编入此书,为我们反映了当代上海社会语言变化的真面貌,这些流行语是我们深入一步研究上海话不可多得的活材料。

市民社会天生具有产生流行语的土壤,因为流行是一种时尚,而都市文明的特点便是多元多变。考察上海方言的流行语,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流行性。许多词语反映了一种流行的时髦的概念,如“大兴”一词就是在一个时期里有的人上冒牌货当多了而流行起来的词。又如“地方粮票”(只限本地通行的利益)一语在各校评定只限本校承认的教授等职称时便在大学范围里流行开来。再如“斩”(敲诈)、“斩一刀”(敲一笔竹杠)则起于有些个体户等坑害顾客行为的泛滥。“吃青春饭”因时装模特、礼仪小姐、宾馆服务员以至陪酒女郎的兴起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女青年中流行。

2. 方言性,社区性。流行语是从一个地区一群人中先用起来的,由于大多数人的母语和日常用语是方言,所以它很自然是起自方言。如“火爆”来自粤语,现在也流行于上海。有些词语迅速反映了某社会阶层中的新的行为特征,如“套牢”(股价下跌资金被困)一语出自上海股市,它随着全民购买股票热兴起而在股民中流行。又如“托福党”用于指称那些为去美国而准备应付托福考试的人。同是粤语,也有社区的不同,如“炒鱿鱼”来自香港,原来广州不用。

3. 俚俗性。流行语产生于闾巷民间,往往只在上海本地流行,是道地的上海土产的俗语和俚语。如“马大嫂”指称每天忙于家务事的妇女,用的是上海话“买、汰(洗)、烧(做饭)”的谐音。又如用“差头”称出租汽车,就取其“差来差去”之意。“西宝兴路报到”隐指死,用的是火葬场所在的路名。“筋搭错”常用于女性骂人思路不正常,神经错乱,男性则多用“短路”。“死蟹”形容完蛋、没希望,起自上海有特色的熟语“死蟹一只”。有小部分的词语还带有隐语性质,为某一圈子里的人通用。如“敲玻璃杯”指找陪酒女玩,在一些经常出入酒吧、个体餐厅的人中使

用；“挑上山”用于激起别人干事时，则起源于有流氓习气的人。

4. 惯用性。不少词语具有惯用语的特征，即词组结构比较定型，意义有所引申，常用特定的比喻义取得一定的习用性。如“劈硬柴”指“AA制”；“大眼睛”指汽车，因两个大光灯而来；“软脚蟹”比喻胆小无用、没有魄力的人；“开荤”先指开眼界，后又指初得性经验，都用首次尝试之义；“帮帮忙”则词义转用到对别人所作所为婉言表示不满，有“别难为我，跟我过不去”和“你省点儿事吧，别瞎说”的意思；“空米袋背米”则指无本买卖。有些词语有常用性，如用“瞎嗲”表示“极好，极精彩”；用“乒乓响”称赞“非常出色，响当当”；用“一只鼎”指“最好，最优秀的”；用“蠢脱了”指对方“太傻了”，指自己“一时糊涂了”；用“不要忒……噢”表示“不亦……乎”的意思，经常出现在群众口头。

5. 阶层性。一些流行语往往在某一层次的人群中使用。有的流行范围大，如“下只角”（市区中条件差、较边缘的居民区）、“垫刀头”（替死鬼，代人受过的人）、“喇叭腔”（事办得很不像样）、“一帖药”（克星，使人服帖的人）、“毛毛雨”（数量极少，小意思，无足轻重，不在话下），这些词语上海人几乎都能明白它的含义，与一般的上海熟语已难以划界。有的流行范围小，只在某一人群或某一场所中使用，如“门汀”（1 000元）在黑市场中用，“过元宵”（发生婚外性关系）在社会层次较低的商贩中用，“叉白板”（白吃白占便宜，黑吃黑）在流氓团伙中使用，“砌墙头”（搓麻将）在热衷搓麻将的人圈中通用，“充电”（上业余学校学习）在中青年干部、职工中流行，“人气”（对股市前景的信心）在股民中使用。有的词语原来只在小圈子里产生和使用，或在社会层次较低的人群中形成，后来使用范围开始扩大，同时这些词语也开始脱黑和脱俗，如“一张分”原起用于黑市隐语，现在用于称呼10元钱似乎说于各种人的口中。这样的词语还有“开大兴”（说大话）、“斩冲头”（敲诈不在行的人）、“立升”（财力，本领）、“拎勿清”（笨，不能领会）等一批。语言本质上是没阶级性的，各个社会阶层都会创造流行语，某个阶层造的词语可能会被其他阶层接受使用，流行与否，关键在于词语的可接受性，词义的生动形象是在群众中流行的必要条件。好在上海的社会从来就是雅俗同乐、兼收并纳，吸收词语也不拘一格、不问出身。其实，现在上海人常用

的“轧苗头”、“讲斤头”、“照排头”、“戳壁脚”、“装樨头”、“避风头”、“空心汤团”等熟语都见于旧时黑社会帮会流氓中的切口,由于这些词语的核心义素比较生动概括,后来使用范围渐渐扩大开来,同时词语意义经历了空心化或曰外壳化的变化,词语的语义场发生了变化,于是词语也就脱黑脱俗成为全民通用的惯用语。如“讲斤头”最初是黑势力以非法举动、恐吓手段借端敲诈勒索财物时用,现指讲条件,讨价还价,词义扩大化了。又如“孵豆芽”原指英雄落难卧待时机,是从瘪三升到大亨的应有过程,现在词义引申扩大到无工作或不参加工作呆在家中。这类情况在词语发展史上是经常发生的。

6. 时间性。大量词语有一定的流行时期。《上海话流行辞典》中收有的一部分流行语是从 20 世纪初期起就流行至今的,如“轧头寸”(做账拉平收支)、“吃生米饭”(说话态度生硬)、“连裆模子”(同伙)、“捉扳头”(找茬儿)、“11 路电车”(两脚步行)、“远开八只脚”(相距很远)等,流行时间一长,便家喻户晓,不过上海人也往往把这些词语视为海派词语,即新派的俗语,以区别于开埠前的俗语。其中,有的旧词已经转义,如“小三子”旧指听差的,现指小人物、打杂的;“瘟生”旧指无社交经验又自作聪明、吃了亏还冥然不知的人,现骂不讲人性不通人情的人;“好户头”旧指妓院里出手大方的嫖客,现指老实人、老好人;又如“放白鸽”旧指假以女子嫁于某人,然后卷走对方钱财逃走的拐骗行为,今指空应诺,开空头支票。再如“红派司”原指党证,现指结婚证书。有的词语曾淡忘过一个时期,而今重又复活起用,如“小老公”指婚外勾搭上的年轻男子,“开房间”指与情人在旅店幽会。“康密兴”是来自英语的音译词,指佣金。还有一些词语缺乏稳定性,只是在短时期中流行,不久就退潮。如“偷电”(偷窥男女之事)一词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青年学生中,以后使用者渐寥;“6 点 05 分”谑称喻头歪向一边者,50 年代在青年学生中流行,现在就很少用了。“大团结”(10 元人民币)在 70 年代使用较多,80 年代中期起就被“一张分”替代。

7. 青春性。年轻人最具青春活力,勇于追赶时代潮流,为了表达他们的新生活新时尚,他们最会在语言上突破。如 20 世纪末的“新新人类”,遇到的新鲜事物太多,体味更美妙,想像更丰富,过去的人是形

容词形容得越细微越好,如“严格”不同于“严厉”不同于“严肃”不同于“严谨”等等,须用双音词来写仔细,区别了才是好,现在年轻人则喜欢用单音词来概括,表现它的模糊的、从中心义素发散开互有联系的、便于想像的含义。模糊有模糊的美,这样的流行词除了“酷”,在上海还有“爽”(痛快、舒服、过瘾、太好了)、“跳”(衣着前卫、鲜艳触目、与众不同、自己感觉好、莽撞嚣张)、“巴”(土气、不入时、不活络)、“牛”(兴旺、精神、有冲劲、有好兆头、态度强硬)、“草”(差劲、无能、没用)、“妖”(奇特、有趣、有意思、想法新奇怪异使人难以入手)、“蠢”(傻、笨拙、差劲、不伦不类、不登大雅、糊涂)、“火”(风行)、媚(长得甜或很嗲)、派(有气派、神气模样)、菜(土气、愚昧)、逗(表示委婉否定,荒唐乖戾)、炫(耀眼)、惨(糟糕)、够 in(很另类、很新潮)、嫩(年轻、没经验)等。

8. 形象性。生动形象是流行语的一大特色。流行语来自生活,民间的生活本身生动活泼,幽默诙谐,宽松不加讳饰,流行语也往往因其生动性而取得流行资格。词语创作者发挥了海派的奇思妙想,巧妙幽默地表现生活。比喻、借代、夸张、通感等是常用的修辞手法。如:“脱底棺材”喻吃光用光身无分文者,“童子鸡”、“毛蜞”喻未有性经验的男青年,“排门板”戏称肥硕者,“柏油桶”谑称腰粗者,“羊脚骨”指腿细体弱者,“打电报”喻“眉目传情”,“跷跷板”喻摆不平,“方向”借代事情的头绪、眉目、恋爱的对象,“黑猫警长”代“警察”和“门卫”,“插蜡烛”指不知趣地处于两个恋爱者所在的地方,“开听头”指酒足饭饱后的打嗝或呕吐,“烂污泥底牌”指不光彩的老底,用“垃圾股”喻指不理想的恋爱对象。以形通义的词语也不少,用“808”称手铐,以“手榴弹”代礼酒,“A型干部”指头尖向上爬无肩不负责任的干部,“皮(B)拆开”隐指十三点,“倒派爱(π)”指夫妻恋人女比男身高高,“对口型”指接吻。利用谐音也能使语言生动活泼,如称健忘者为“王伯伯”;故意说反话触人的霉头称“丢(音笃)煤球”;讨厌人话多,说烦得像“饭泡粥”;“135”指酒,取三数相加为9的谐音。利用歇后语的方式构成的,如“城隍老”歇后“爷”字,自称父亲;“猪头三”歇后“牲”字,骂人畜生。有些词语造得幽默诙谐,充分表现了创造者的聪明才智和生活情趣,如“电灯泡”喻光头,“外国礼拜”指法定假日以外的意外或临时休息日,“11点8刻”戏

谚十三点，“马路天使”称跑外勤的供销员，“量地皮”指把人强行平放地上，“开脱排”喻溜走，“攒烂山芋”指糊弄、瞎蒙、欺骗性唬人，“克林顿（家里蹲的谐音）大学”讽不需去上课能发文凭的野鸡大学，“567（音谱读法为扫垃圾的谐音），保密厂”指环卫所或清洁管理站，“学习 144 号文件”指玩麻将。值得注意的是，流行语在构词方式上也有创新，除了新造不少音译或半音译词（如“番司”指脸，来自 face；“大令”指亲爱的，来自 darling；“开许”指现金，来自 cash；“飞阳伞”指未婚妻，来自法语 fiancée；“打开司”指接吻，来自 kiss；“搭壳子”指追求女性时的仪态举止，来自 colt；“大妹苔丝”指不行，不正宗，来自日语だめです）外，直接使用英文字母或英文缩写的新词也产生了，如：“T 恤”指 T 形领子的衬衫，“W. C”指厕所，“BF”指男朋友，“GF”指女朋友，“A 收”暗示警察来了快收摊，“F1F2”指因嫉妒而利用各种问题作支点阻碍别人成功的人，出自物理学力点、支点；“24K”指最黄色的录像带。这些词语的产生预示着在开放的年代里汉语词中一种更为开放的字母直接介入构词的新形式将会大量采用，先产生在口语中，后形成文字。

由于上海话流行语具有以上这些特色，它就成为上海方言语汇中一个活跃和敏感的成分，为社会所关注。有不少外国人初到上海很快就学会了某些流行语，他们感到要与上海人打成一片，这些词语才是真正具有上海地方色彩的土语。但是上海的一些人对这类词语的看法并不一致，该不该通用这些敏感的词，常常要发生争议。典型的一次是 1962 年 4 月《新民晚报》“街谈巷议”栏中对“嗲”（词义为“好、精彩”）字的一场争论，一连登载了 6 篇文章，恶之者欲其死，爱之者欲其生。笔者当时是初生牛犊，写了《为“嗲”字一辩》一文，只是为当时年轻人中广为流行的“嗲”字辩护了几句，想不到引来了一片围攻声。这次辩论几乎集中了双方对这类词语看法的全部观点。总括来说，反对的意见有这么几点：① 出身低劣论。“嗲”一类词为一小圈人中的“行话”，最初出自“小流氓”之口，哪可随便登大雅之堂？帝王将相怎么可以由陈平、韩信、刘邦、朱元璋来做呢？② 词汇贫乏论。青少年开口闭口把什么好的东西都说成是“嗲”，难道不是说明他们没有学会丰富优美的祖国词汇吗？③ 有碍文明论。“嗲”的批准会使它的孪生弟兄都猖獗起来，

如果大家满口听不懂的黑话,岂不有伤风化吗?④ 语言规范论。中国已经有着那么厚的词典上的那么多规范好了的词语还不够你用?干吗非得要去拣起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词语呢?真不可思议!

可以预料这样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发生下去,但是语言的发展自有它固有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好恶为转移。上海话是一千万上海人天天在说的话,谁也无法左右它的发展趋势,某个词的取舍也不可能靠行政命令,而是取决于说上海话的人的民俗、社会心理、文明程度诸因素的变化,时间倒是考验新词生命力的惟一尺度。“嗲”字的这场争论至今已近半个世纪,“嗲”字仍活跃于上海人的口中,而且“嗲”的两个义项都已载入了1996年出版的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

与“嗲”字相似的情况在北京的报上有“盖了帽”和“的士”的争论。曾几何时,当《人民日报》上出现了“中国女排盖了帽”的标题(1981—3—30)时,有人高声疾呼出身大为不雅的“盖了帽”居然登上大雅之堂,太不严肃了!现在不也收进《现代汉语词典》了吗?

这里就用得上从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去予以解释。语言归根结底是约定俗成的习惯体系。有人说语言的规范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是词典上的用语,事实是书面语来源于第一性的口语,口语是书面语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源泉,不但规范应是先在口语中形成然后才有人在书面语中运用编进词典明确用法,而且要检验某词是不是这样用法,某个句子是不是符合语法符合规范,世界上语言学家通用的常识是得问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说不说用不用。语言又是呈动态变化着的。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断地系统化的语言也不断地表现出它的某些不规则性,社会各阶层在使用全民语言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社会上各个阶层里新出现的那些流行语正是民间产生的反映各阶层新动态的生动活泼的口语,这些流行语的整理正是语言学家需要深入调查社会语言并分析研究其规律的有意义的课题。例如隐语的产生及其流传扩散的方式和条件就是一个颇有兴味的课题。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立足点,是通过从社会环境中对语言直接考察来了解语言,还是以书面材料如词典上的有无作为标准和出发点来了解词语?《汉语大词典》上的一半以上词语我们今天已经不用了,我们天天都在产生新词语,这就

是推陈出新。有的人津津乐道地考释两三个在古代文献上偶尔露面两三次的已死词语(这也有必要),却对今天大众正在使用的词语不感兴趣,或嗤之以鼻,这才叫怪呢!新词语是新生活的见证,它们又不见于词典,人家查不到,这就是语言文字工作的滞后。新时代必须有新鲜语言与之对应,新词当然未必都是好的,就像旧词未必都是好的一样。语言的发展也自有择优除劣的功能。我们规范语言的目的,应该是使我们使用的语言摆脱墨守成规干瘪无力而大量吸收新鲜活泼的口语创造性地健康发展下去。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流行语,了解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文化群体是如何组成复杂多层次的社会行为的。从人类行为学的眼光看,不同层次的人创造不同的流行语,反映着他们不同的行为生态。老年人中有“开荷兰水”(喝倒彩),孩子们里有“赖学精”(讽逃学者),文人中有“爬格子”(写稿子),流氓中有“对开”(一对一较量),教师中有“背猪猡”(收学生补课赚钱),学生中有“吃鸭蛋”(得零分),营业员中有“拍半身照”(站柜台),顾客中有“冲头”(被商家敲了竹杠的人),干部中有“校路子”(纠正、开导、做思想工作),职工中有“天勿亮”(指无精打采、眼皮惺忪的样子),五七干校中有“屁股架子”(指凳子),农场职工中有“外国礼拜”,个体商贩中有“打底脚”(指包水果时在袋底放上劣质水果),驻沪机关中有“坐庄客人”(外地、外商驻沪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警察中有“拉网”(大规模搜捕罪犯),小偷中有“打样”(侦察、窥探动静)……。我们可以从中窥察不同人的不同经历和行为特点。不同阶层的人的流行语又是相互影响的,什么情况下互相接受又说明某种人的社会心理影响着另一部分人。老年人和以教育者自居的人往往自己也说着些流行语,却又对年轻人说流行语持反感和压制态度,青年人和下层民众的心理喜欢追求特色刺激,常对以说新词为时髦持积极接受的态度,这本身就反映不同年龄层次或不同地位的人的或保守或稳重或创新或猎奇的生活态度。低层次的流行语带有庸俗性,但低格调的词语往往却又粗鲁坦直,可以是我们观察人类行为的一个窗口。例如性行为是最基本的人类行为,你不说,装作“高雅”,像不食荤腥一样,老百姓还是要说的。人类的性行为较隐蔽一点,但从不少描

写性方面的流行语中却可以研究性心理。因此,分析流行语言实际上也就是分析人们的各种流行行为,是人类行为学的一个研究课题。

社会的发展使流行语产生和发生变化。有不同的社会层次才构成了复杂多元有趣的社会,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流行语的形象具体生动性,流行语多角度地提供了我们各阶层社会风貌的真实信息。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自由交易和黑市场的兴起和活跃,涌现了一批新词语,像“一笼”(100 元)、“扒分”(赚取额外收入,也泛指挣钱)、“大兴货”(低劣冒牌货)、“礼拜三(衫)”(穿一星期就坏的衣服)、“肉里分”(血汗钱)、“跑秤”(缺斤两)、“大放盘”(慷慨出让,大降价)、“起板价”(讨价还价的最低价)等。90 年代,随着股市的兴起,又出现了一批新词语,像“牛市”(交投量活跃、股价持续上涨的股市)、“盘子”(股票发行的规模,又指二手证券交易市场)、“跑道”(成交机会)、“多头”(买进股票作为筹码等待抛出)、“火棒”(价位已很高、风险很大的股票)、“卖盘”(委托申请卖出股票的人数和股票量)、“刮盘”(买进股票的量和势头)、“调位”(对股票交易行情进行行政干预调整)、“割肉”(因股价下跌而忍痛抛出)等。人们讽刺请客送礼风,于是有“烧香”(行贿)、“进贡”(为利用他人而送礼)、“手榴弹”(两瓶或四瓶一扎的瓶酒)、“炸药包”(方盒网装的蛋糕水果等礼物)等词出现。人们痛恨缺德的人,于是有“撬客”(因嫉妒而在背后作梗设障说坏话的人)、“茄勾”(扑克牌中的 J 牌,转指心胸狭窄暗地损人的人)、“翘反边”(指暗地里说某人坏话,损害某人的利益)等词出现。生活中需要调侃,就有“11 点 8 刻”、“6 点 05 分”、“四只眼”(戴眼镜的人)、开棚(开门营业)、上班(玩麻将)等词流传,流行语里表现出日常生活中的丰富情趣。《上海话流行语辞典》对大部分的流行语都说明了其开始流行的大致年代,这对我们观察不同时期的社会动态无疑是有利的。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的真实面貌,社会语言的动态发展直接反映着社会现状,它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活跃多彩性,青年认识生活的创造性,下层社会的俚俗性,所以流行语是社会学研究的好材料。对于社会学来说,对社会既要有宏观的调查,也要有微观的察访,越是微观对社会生活了解也就越是深入细微。社会的客观存在是,文化水平、社会层次高的人的语言不断地影响感染着文化水平、社

会层次低的人,同时,文化水平、社会层次低的人的语言也时时影响着文化水平、社会层次高的人。社会对某个新词的普遍接受程度正反映着这个社会的人们的道德风尚的水准、思想面貌和文明程度,它是受该时期社会文明水准的制约的。语言反映的是客观的社会现实,流行语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低格调的词语。污秽的词语来源于污秽的社会存在,社会现实中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回避阴暗面的社会调查是不全面的调查,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上海话流行语辞典》不避里巷猥辞,也收集了诸如“公车”(指可随意跟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敲煤饼”(嫖女人)、“轧轮子”(在公交车上做扒手)、“赤脚”(输完赌本)、“上山”(加入团伙,被捕)等词语,对我们认识各层次的社会、克服交际障碍也有一定帮助。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说,大力发展教育,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提高社会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从而克服流行语中不文明因素的必备条件。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到20世纪末,新词新语的产生和流行形成了高潮期。因特网给流行语领域带来了许多颠覆性的大突破。这主要表现在:①从底层到高层。过去的流行语往往产生于较低层次的群众,文化程度不太高的人群;如今网上的层出不穷的流行语主要从青年白领、知识阶层产生,俚俗性大为降低,流行语的文明水平顿时提升很多,而且还常常领时代之先,带来科技、文化的新潮流。②从社区性到全球性。过去的流行语往往在一个社区中流行,通行地域小;现今的流行语在世界华人圈里都流行,有些词语还直接从英语流行语中借来。③从方言性到普通话性。在网上流行的都是用拼音输入的共同语流行语,有的原在方言区中的方言流行语也流通到全国。④从阶层性到全民性。因特网使流行语的阶层性模糊了,凡上网者全民通用。⑤从口语性到书面语性。网上流行语不需要“批准”,一方面具有更彻底的语言约定俗成性,另一方面它一开始就在网上“写”成,其语义定型和文字定形要比以前快得多。网络时代使流行语发生那么大的变化,然而流行语的青春性依然不变,更加动人,因此流行语还是流行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另文详述。(钱,2002b)

社会流行语又是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的桥梁。方言和民俗有着密

切关系,过去的方志总把一地收集的方言编入民俗章卷。民俗是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生活、文化、历史、习惯,民俗学家可以从方言俚语中获得大量的时尚风俗信息,无论是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还是信仰的民俗、游艺的民俗,都用众多的词语记录了下来。从大的方面来看,上海地区具有海派特征的流行语特别多,土气重的词语特别少,这反映了上海这个有着 160 年开放传统的社会的民风喜欢创造和兼收并蓄。越是收集俚俗的词语便越能了解本地深层的民俗文化。这里又要讨论俚俗和典雅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文明史本身就是一部俗雅轮环史,雅俗之争贯穿着整个社会史、文化史、文学艺术史。宫廷贵族为雅,陋巷贫民为俗,庙堂文学为雅,引车卖浆之徒说的话为俗。也许人们感到太雅了也并不舒服,于是有孔子整理国风,汉帝搜集乐府,唐宫殿中群胡齐舞,宋儒去勾栏谱词,冯凌编《山歌》和三言二拍;于是有人出来疾呼向贵族文学、谬种妖孽宣战,申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言中也有俗雅,总有人要面向下层,从俚俗中窥见真谛,去了解在满目充耳的浮辞华语高论范文装饰下的民众生活的真相。阮、吴两位先生愿意这样做,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社会风貌的忠实记录。